

# 明代山东小云南移民浅谈

张金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初，由于山东地区人口损耗严重，政府有组织的从其他人口富余地区迁移了大批民众到山东定居生活，从而在山东半岛形成了多个方向的人口流动的状况。本文试就当地广泛分布的小云南移民的真伪及其来源作一粗浅分析。

小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胶东一带。据刘德增考察，胶南县云南移民村落占总数的 30.98%，胶州市云南移民村落达到 22.42%，青岛市崂山区则高达 48.42%。相对而言，山东半岛北部云南移民村落要少得多，比如牟平市只有 7.18%，文登市占 2.52%，比例最高的烟台市福山区，也不过 22.03%。半岛内地的云南移民村落同样很少，如莱西市，只占到总数的 4.5%。<sup>①</sup> 从这一分布状况来看，所谓小云南移民似与明朝在山东沿海的卫所分布有某种关联。

## 一 既往研究回顾

与主要分布在鲁西一带的枣强裔移民在历史上被较早提及，但未受学界充分重视不同，小云南移民较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枣强移民。最早提及小云南移民的是民国《莱阳县志》。在县志的《附记》中，编纂者这样写道：

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余各姓除从军或流寓，历年尚少，则凡传二十余世、历五百余岁者，大率相同，而能确定其原里居亦多族，十之八九漫称云南。又谓户有占山、买山，宋元旧家则为漏户。及诘其所以迁徙，及何以占山、买山，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缙绅世家，亦语焉不详。

征诸历史，度以理势，滇洱蛮荒，久寄化外（唐属六诏，宋属大理）。元置行省不及百年，而洪武二年梁王（云南东部）犹为元守，大理仍属段氏（世为首长）。明兵力未及，安得有迁民之举？此其说不攻自破也。且考《明史·本纪》，洪武四年三月，徙

<sup>①</sup> 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8—119 页。

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山后即山北，石晋以来燕曰山前，云曰山后，号为燕云十六州）。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散处诸府州县，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又徙浙西、山西民于滁州和北平、山东、河南。九年，徙山西及真定无业者田凤阳。永乐元年，徙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户实北京。二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是明初亦无云南迁民之事也。

或谓云南为豫南、汝南之讹，或谓小云南在安徽境内，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亦均之无稽。虽然，要自有说，意即洪武四年，山后内徙之民也。盖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昔即以云称。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冈、云阳、云泉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而莱阳自金元以来，用夷变夏，屡经兵祸，民之死于锋镝，或掳掠流徙者，当不知凡几。用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谓之占山，后至者购买熟地耕种，谓之买山。其土著遗民得脱于兵匪驱掠者谓之漏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又别之为小云南。亦犹吾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

今走辽吉，问其先世，率称海南。而诘其籍贯，则莫有详。即其附近同姓谓同族与非同族，亦往往无征。是则远徙异域，无谱牒以为联属，大类县中同姓世传为一家，而系统无考者焉。唯当日迁自小云南者，或不如传闻之众。即称为漏户者，亦当不如现时之少。是则历明及清，迭遭惨杀。死亡流离，宗谱损毁。或畏避徭役，迁自他处，原无谱牒。历年既久，传闻失实，遂胥附于迁自云南之说矣。顾荐绅先生必执云南二字，确信为滇洱编氓，迨于明初迁民之时地未考核焉。<sup>①</sup>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作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西学的影响，因而对家族等社会学范畴的内容颇为关注，不论是专门的乡土志，还是常规的州县志，都对本地区的人口构成（包括民族、氏族等）有一定的调查和描述。小云南移民能进入地方志的记载，和这一文化背景有直接联系。从上引文字来看，《莱阳县志》的编纂者不仅注意到了小云南移民的存在，还对其真实性进行过讨论，提出了多种假设，只是最终采纳了“云中之南”的说法。而其提出的“当日迁自小云南者，或不如传闻之众”，“历年既久，传闻失实，遂胥附于迁自云南之说”的观点亦颇有见地。

民国《莱阳县志》问世不久，其“云中之南”的观点即得到民国《牟平县志》作者的回应。后者认为此说“虽无据而近理”。不过后者并没有轻易否定云南说的真实性，“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阙之以俟知者”。<sup>②</sup>

此后，关于小云南的讨论归于沉寂。1993年，风良发表《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sup>③</sup>一文。本文在观点上并无新意，只是重复了民国《莱阳县志》提出的小云南即云中之南的观点，但却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小云南移民问题的关注。1998年，朱端强针对此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小云南移民确系从云南省迁出的移民，且有从军、充军和抗倭入齐三种移民方式。<sup>④</sup>这是笔者见

<sup>①</sup> 民国《莱阳县志》卷末《附记·杂述·云南迁民》，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82页。

<sup>②</sup> 民国《牟平县志》卷一〇《杂志·轶事》，济南山东印刷局铅印本。

<sup>③</sup>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sup>④</sup> 朱端强：《〈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商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到的第一篇公开肯定小云南移民确实来自云南省的文章。二者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引发人们的研究热情，对小云南移民问题的热烈讨论由此展开。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不承认小云南移民和云南省存在联系，进而就小云南的实际指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谭雨明提出“小云南不在山西，也不在云南。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鳌山卫”<sup>①</sup>。王诵亭认为小云南移民都是山西移民，<sup>②</sup> 张德玉也认为小云南指的就是山西雁云十六州之地。<sup>③</sup> 吕伟达认为“小云南”在河南固始县南，“当地有一云水，称云镇，人们口传的小云南，皆指此地”，但移民所称祖籍云南，则指“云州或云中之南”<sup>④</sup>；夏树藩则认定小云南在贵州省境内。<sup>⑤</sup>

与之相反，另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小云南与云南省存在必然联系。这一派的观点又大多集中在两个点上。一是云南省肯定存在小云南这个地区。如边百森指出《明太祖实录》中有关于小云南的记载；<sup>⑥</sup> 龙圣《“小云南”考辨》<sup>⑦</sup> 则考证出宋代即存在“小云南”，且在大理国境内；吴光范《“小云南”考》<sup>⑧</sup> 具体认定小云南在今云南省祥云县；袁辉《也谈“小云南”》<sup>⑨</sup>、鞠明库《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sup>⑩</sup> 等文亦大体支持小云南在祥云县的观点。

除了在史籍中寻找依据，部分学者还试图从其他途径判断小云南与云南省的关系。如张彩霞通过对比即墨一带和云南地区流行的创世纪神话故事及祭祖习俗认定小云南移民确实是云南籍移民。<sup>⑪</sup> 任光伟在《谈东北汉军旗人及其“烧香”与云南流人之关系》<sup>⑫</sup> 一文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指出流行于东北、自称祖上来自云南的汉军旗人中间的祭祀习俗，如换谱、跳虎神、花关索信仰都与云南民间习俗类似，并进一步认定这些人的祖上是被清廷从轻发落的吴三桂叛军。

二是分析云南移民的迁徙路线。如张健《再问“小云南”你从哪里来？》<sup>⑬</sup> 一文认为先民先随明朝征南大军进入云南，再因战略转移迁往山东，清初又因鼓励垦荒的政策迁往关外。吴光范则提出云南移民既有北向、东向两条迁徙路线，又有南向经越南，泛海至山东者，且南向走水路是主流。<sup>⑭</sup>

随着双方讨论的深入，又出现了一些试图弥合双方分歧的观点。如王玉珉提出云南小云南和山西小云南并存；<sup>⑮</sup> 吕杨认为“小云南”只是明初移民大潮中的一个抽象名词，其组成成员包

<sup>①</sup> 谭雨明：《小云南与明清移民》，《寻根》2003年第10期。

<sup>②</sup> 王诵亭：《青岛地区明代移民》，《春秋》2008年第1期。

<sup>③</sup> 张德玉：《谈八旗汉军家谱中的“小云南”》，《满族研究》2010年第4期。

<sup>④</sup> 吕伟达：《福山移民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48、154页。转引自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sup>⑤</sup> 夏树藩：《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满族研究》1999年第1期。

<sup>⑥</sup> 边百森：《〈明太祖实录〉中的“小云南”》，《寻根》2011年第1期。

<sup>⑦</sup> 《寻根》2011年第4期。

<sup>⑧</sup> 《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4期。

<sup>⑨</sup> 《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

<sup>⑩</sup> 《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

<sup>⑪</sup> 张彩霞：《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

<sup>⑫</sup> 《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3期。

<sup>⑬</sup> 《中国地名》2003年第6期。

<sup>⑭</sup> 吴光范：《“小云南”考》，《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4期。

<sup>⑮</sup> 王玉珉：《小云南迁民释疑》，《中国地名》2004年第11期。

括山西、枣强和一部分云贵移民以及曾经在云贵地区服役或调防山东的云贵籍军人;<sup>①</sup> 王砚天在肯定小云南移民来自云南省祥云县的同时，强调众多移民后裔把小云南作为自己的祖籍是一种移民文化的认同，<sup>②</sup> 等等。

## 二 解读“小云南”

在众多的族谱资料中，不仅有称祖上来自“小云南”者，也有径称来自云南者，如熊崖所《王氏宗谱》称其祖籍为云南省桃花村；<sup>③</sup> 即墨《李氏族谱》记载：“始迁祖福、雄兄弟二人，旧谱说是明永乐二年自云南徙燕京剪子巷，又由燕京来即墨蒲渠，后雄又移居段村。”<sup>④</sup> 另外，还有称来自“大云南”者，如即墨葛氏称“祖籍本是大云南，迁于即墨崂山前”<sup>⑤</sup>。不论如何称谓，总归和云南有关。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明初的山东移民中，肯定有来自云南者。比如元代名臣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曾孙赵明远。赵明远是赛典赤的长孙伯颜的幼子，其上还有两位兄长，赵明高和赵明方。按其家谱记载，“明太祖混一中夏，时换朝移，本枝散乱，或还西域，或徙北平，或迁河右。明高、明方相继死节，惟明远蒙明太祖深嘉其讳，敕谕同始祖母、诰封一品夫人马氏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其余勋臣子弟保全忠孝者俱发南北为民。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京，至丙寅初六日入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sup>⑥</sup>

赵明远的兄长赵明高，元至正朝曾任职枢密院，故在大都居住。从谱序中看，赵明远等人也在大都生活，因而在元顺帝北逃后被逐出北京，安置到了青州。赛典赤来自西域，信仰伊斯兰教，故其后人在青州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赵明远的曾孙赵信即曾任本城掌教。

赛典赤是云南建省后的首任平章政事，其后裔长期在云南生活，应该算是云南人。如果说赵明远一家是从北京迁往山东的，算不上典型的云南籍移民，那么，登州王氏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王氏始祖名王忠，“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人。旧传为小云南鸡儿头王家。任邑之登宁场盐大使，卜居古现集之河北村”<sup>⑦</sup>。《王氏世谱》亦称王忠“原任山东盐运司胶莱分司登宁场盐课大使，官署在福山城北盐场村。休致后，乐此风土，因留籍……遂世为福山县孙夼社一甲古现集河北村人氏”<sup>⑧</sup>。

<sup>①</sup> 吕杨：《“小云南”探源》，《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sup>②</sup> 王砚天：《“小云南”——独特的移民文化符号》，《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sup>③</sup> 即墨市政协教科文与文体文史委员会等编：《熊崖所古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sup>④</sup> 即墨：《李氏族谱》，1999年编印。

<sup>⑤</sup> 浮山所百户寨《葛氏族谱》，转引自朱光涌：《洪武、永乐时期山东莱州府南部移民研究——兼论卫所制度与沿海地区移民》（2008年硕士论文，中国海洋大学）。

<sup>⑥</sup> 《青郡赵氏宗谱·圣裔赵氏家乘序》，此序由其十三代孙赵庆臻撰写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第48册《民族卷》影印旧写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sup>⑦</sup> 《王氏家谱》，《天津图书馆家谱丛书》影印雍正十二年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整理者原题为云南大理王氏，实际应为山东福山王氏。

<sup>⑧</sup> 《古现王氏世谱》，《天津图书馆家谱丛书》影印清末稿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河北村原有王氏一族，“旧有王姓数百家”，王忠一家迁入后，“与之同处”，后“四大支续日繁夥，至村不能容。彼王旧姓消灭无余，吾族全有其业，甲于西北”<sup>①</sup>，成为福山县的大家族。清末甲骨文大家王懿荣即来自王家。

更值得重视的是，王氏后人在清代曾两次赴云南寻根访祖。其十世孙王漪，康熙五十二年（1713）“筮仕云龙州，路经小云南镇。平原开阔，山川秀发。访所谓鸡儿头村，渺不可得。古云三十年为一世，漪去始祖十世，今更益五世，忆其时当在前明洪、永之间”<sup>②</sup>。此后，十一世孙王果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趁着就职于大理的机会，“遍询土人，始知鸡头村今改隶蒙化府属，村居王姓数十人，以务农自赡。但知述元末自江宁迁去，家无谱系，□详，终不可考”。<sup>③</sup>

虽然没有找到亲眷，但证明了大理府确实曾有一个鸡头村。因此可以判定，王氏祖传的迁自云南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此外，据其家谱记载，其乡邻郭氏始祖、来自江西万安县的郭福辉，“当洪武初以备倭迁福山”，其三世郭享“系天顺六年甲申恩贡，犹后王甲十三年，则我始祖来福山时大概在洪武之世乎”<sup>④</sup>？因有具体的参照，其推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与王氏类似，很多宣称来自云南的移民后裔都曾提到相对具体的云南祖居地。如牟平尹氏，“原籍云南蒙自县杨柳村，明初迁至海阳上尹家”；<sup>⑤</sup> 莱阳张氏，“原籍云南大理府浪穹县川横沟”；<sup>⑥</sup> 平度吕氏，“明末由云南石坪州迁至山东即墨”；<sup>⑦</sup> 黄县张氏，“明弘治间自云南大理府云南县迁黄”；<sup>⑧</sup> 黄县林氏，自称“明代由四川会理县所谓小云南者迁黄”<sup>⑨</sup>，等等。

上文中提到的浪穹县，洪武十六年设，隶属大理府下之邓川州，今名洱源县。云南县，元朝时为州，洪武十五年改为县，直属大理府，十七年改属府下之赵州，即今祥云县。石坪州是元代的称谓，明洪武十五年改曰“石平”，后又改为“石屏州”，隶属临安府。蒙自县，亦在临安府境内。

会理县的情况更为复杂。元朝时曾设会理州，属会川路管辖。洪武十五年三月，明廷曾设会川府，隶属云南布政司，但十月即改属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六年后，废置该府，原有辖区统一归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管辖。会理州因此也被撤销，直到清康熙年间才恢复为州，民国二年才改为县。黄县林氏的资料来自民国《黄县志》，并非族谱原文，不排除方志作者做了一定修改的可能。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县志作者所依据的族谱修撰于民国年间。栖霞县《米氏族谱》即记载其始祖米强，“原籍四川会理县小云南地，明洪武二年由顺天府徙居山东省栖霞县城东上曲家”。<sup>⑩</sup> 可见，民国初年修撰的族谱确有采用当时地名称谓的现象。

在云南地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除了“小云南”，就要属“乌撒（沙）卫”了。如即墨张氏，“闻先人祖居小云南乌撒卫十字街大槐树底下”；迟氏，“吾祖于明永乐二年从云南乌沙卫牛角胡

<sup>①</sup> 《王氏家谱》。

<sup>②</sup> 《王氏家谱》。

<sup>③</sup> 十一世孙王检撰：《家谱述》，见《古现王氏世谱》。

<sup>④</sup> 《古现王氏世谱》。

<sup>⑤</sup> 民国《牟平县志》卷三《氏族》，济南山东印刷局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sup>⑥</sup> 《续修张氏谱书·世系》，民国二十年烟台东鲁印刷局代印本。

<sup>⑦</sup> 平度信村《吕氏族谱》，民国二十三年刊本。

<sup>⑧</sup> 民国《黄县志·民社·氏族》，转引自王玉珉：《小云南迁民释疑》，《中国地名》2004年第11期。

<sup>⑨</sup> 民国《黄县志·民社·氏族》，转引自王玉珉：《小云南迁民释疑》。

<sup>⑩</sup> 城关村《栖霞县米氏族谱》，1946年修，转引自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祖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同迁居即墨迟瞳”,<sup>①</sup> 等等。

洪武十四年,明朝政府发动收复云南的战争,当年即占领多民族聚居的乌撒地区,并设置了乌撒府,隶属云南布政司。次年正月,设乌撒卫、普安卫等十四卫。洪武十六年正月,又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先是,乌撒等部诸蛮复叛,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率兵讨之,大败其众,进军搜捕余党,有潜匿者皆捕而杀之。诸蛮慑惧,相率来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隶之”。<sup>②</sup> 洪武十七年五月,又将邻近的云南东川府划归四川,并与乌撒、乌蒙、芒部三府一起改为军民府,实行准羁縻统治。

乌撒卫虽然主要辖区在乌撒军民府境内,但在隶属关系上并没有随乌撒府一起划归四川都司,而是一直属于云南都司管辖。贵州建省后,乌撒卫又于永乐十二年改属贵州都司,但永乐二年组建完成的乌撒卫后千户所依旧设在云南沾益州境内,所治在“州治西北”<sup>③</sup>。这样,乌撒卫就成了一个横跨三省的军卫,虽然隶属贵州都司,但辖区却在四川和云南省境内,这也是明朝政府“犬牙相制”设卫思想的具体反映。部分学者提出小云南移民来自贵州,正是对明朝这一颇具特色的军事建设思想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

如此众多的实际存在的云南或邻近云南省地区的地名出现在族谱资料当中,显然不能用“云中之南”一类的观点来解释。在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小云南”的具体指向做一个判断。

在《宋史》中曾出现关于“小云南”的记载:

凡风琶、两林、邛部皆谓之东蛮,其余小蛮各分隶焉。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汉亡命,侵掠他种,闭其道以专利。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sup>④</sup>

可见,在宋代,“小云南”是对云南地区“邛部”少数民族中之一支的称谓。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明廷更定蕃国朝贡礼仪。在云南所属所谓西南夷当中提到了“土官三:海东、宾居、小云南”<sup>⑤</sup>。

嘉靖间充军云南的杨慎在《滇程记》中也曾提到“小云南”:

自镇南州普淜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所经有桃树坡、金鸡庙、孟获箐、安南坡,坡有巡司。下坡地复坦夷,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sup>⑥</sup>

《实录》和《滇程记》中提到的“小云南”显然指的是某个确定的地理区域,后者更明确地提出其为云南县境内的古云南郡治所在地。

朝鲜《李朝显宗实录》中也有关于“小云南”的记载。如壬寅三年四月甲寅条载:“清兵

<sup>①</sup> 转引自张彩霞:《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

<sup>②</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一,洪武十六年正月辛未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以下同,第2380页。

<sup>③</sup>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四《云南二·罗平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排印本,第493页。

<sup>④</sup> 脱脱等:《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4231页。

<sup>⑤</sup>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庚辰条,第3395页。

<sup>⑥</sup>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七《云南五·云南县》,第732页。

入小云南，执永历皇帝以归，大明绝，不祀。”<sup>①</sup> 同年十一月庚寅条记载：“陈奏正使郑太和、副使许积、书状官李东溟等回自北京。闻之沿路，永历皇帝为清兵所执遇害，朱氏子孙之逃生于小云南者，亦皆为清兵所杀云。”<sup>②</sup> 吴三桂捉拿永历皇帝的地点在缅甸境内，可见当时人也有称毗邻云南的缅北地区为小云南者。

综合以上资料，笔者认为所谓的小云南既是一个确定的地名，如杨慎所载，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从川、滇、黔交界的乌撒等多民族聚居区，向西一直延伸到缅北一带，包括明代云南的曲靖、寻甸、武定、大理、永昌等府以及毗邻的四川部分地区。而小云南的得名和大理国又有一定的关系。

从汉代开始，云南北部地区就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蜀汉时，诸葛亮曾设云南郡，管辖今川南、滇北一带，后辖区虽然多次变更，但云南郡的设置一直延续到隋朝初年。唐朝中叶，南诏兴起，并曾向外大力扩展版图，控制范围涵盖今云南全境以及邻近地区。南诏建立者皮逻阁，唐朝政府册封其为云南王。南诏灭亡后，大理政权继起，但版图大为缩小，大体收缩到今滇西北一带。《宋史》中称大云南蛮、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这里的“小云南蛮”，大体指的就是大理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大云南蛮”则分布在更广泛的区域。

那么，明初是否真的存在云南人口向山东半岛迁移的现象呢？

### 三 云南移民迁徙路线假说

对于移民的迁徙路线，部分族谱中有比较清晰的记录。如《张氏族谱》记载：

溯吾张氏，云南故乡。宗长常山、宗次双山、宗三三山、宗四单山，洪武迁民驱渡长江，路过浔阳，迷失单山，一路查访，无处寻觅，还登州蓬莱城里家焉，七甲八社，乡称九兰。逊清定鼎，自由自便，先祖宗龙跨海移迁……<sup>③</sup>

对于离开云南的原因，谱牒中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归咎于元末丧乱。如栖霞《孙氏族谱》称“我支世居云南……元末群雄割据，盗贼蜂起，兵来贼去，兵去贼来，西南各省，十室九空。我恢祖乃舍云南之产，迁居山东”<sup>④</sup>。

但恰恰是这样的记载让人怀疑。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天完政权从湖广发端，继而向四川、江西等地拓展，部分波及到了云贵地区。但当时的云南在梁王的治理下，并没有遭遇过多的打击，较之长江流域要安静许多。谱牒中经常出现的乌撒地区“有盐池、银矿之饶。其民

<sup>①</sup> （朝鲜）《李朝显宗实录》卷五，壬寅三年四月甲寅条，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八年（1963）影印本，第125页。

<sup>②</sup> （朝鲜）《李朝显宗实录》卷六，壬寅三年十一月庚寅条，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八年（1963）影印本，第150页。

<sup>③</sup> 《张氏谱册·序》，转引自李林：《满族宗谱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09页。

<sup>④</sup> 下马河村《孙氏族谱》，1937年修，转引自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祖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习奸利，往往侵略邻境”<sup>①</sup>。按常理，大乱时期，应该是内地人口由湖广、四川等地向乌撒等地迁徙才对，云南民众没有理由离开乐土，扑向战乱频仍地区。即便有小规模的北上人口，数量也会很少，能远徙到山东地区的会更少。

认同山东存在云南移民的学者大多将其与明朝的军队调动联系起来，在谱牒中也确实有很多“证据”。如熊崖所《谢氏祖谱》载，谢氏一世祖谢成，河南归德人，至正二十五年归附。二世祖谢敬，曾转战云南大理等地，“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钦除山东管垛集军百户职事，六月到莱州卫任百户”。<sup>②</sup> 又如熊崖所朱氏，始祖朱茂诏迁居云南，“永乐中，东支一世祖朱汉迁居熊崖所，任百户”。<sup>③</sup>

在官方史料中，也有少量反映。如《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四月“诏以故元云南平章段世、宣慰段名随侍齐王，给千户禄”。<sup>④</sup>

按照朱元璋的预定计划，在收复云南后，需从当地征兵立卫，守御本省。但傅友德等在平定云南后发现“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于是只好奏准，“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sup>⑤</sup> 虽然说是暂留，但因云南旧军户尺籍无存，这些军士不得不改为永久戍守。

这里虽然没有提及山东都司，但山东地区的军户因为和旧政权及地方割据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被人为地大量调离本省，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安置到了京卫。在征南之役中，京军恰恰是主力。因此，随着云贵一带卫所的陆续设立，大批山东籍军士进入了云贵。为使士兵能在云南安心服役，明朝政府又多次遣送其家属离京，前往团聚。如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朱元璋下旨：“（云南）各卫所上紧屯种，尽问军人每，若是有粮，便差内官送将家小来。”<sup>⑥</sup>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sup>⑦</sup> 等等。这样，就有更多的山东人口迁徙到了云贵地区。

这在地方志和谱牒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乾隆《腾冲州志》记载，腾冲卫下辖六个千户所，其中“前所自洱海卫调，多江南、山东、湖广籍”；“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改设，多土人，亦间有江南、山、陕、湖、川等处籍”。<sup>⑧</sup> 毕节《路氏族谱》记载：“祖居宜兴，既迁历城。明初，鼻祖以指挥从军至黔，遂家于毕。”<sup>⑨</sup> 腾冲李氏始祖李德，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北城。洪武四年从军，次年调到南京威武卫，任总旗。十一年，调府军右卫前所，升百户；十四年，升千户，率部随西平侯沐英等南征云南，先后在普定、曲靖、东川等地征战，并留守当地。洪武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调任云南前卫前所千户。二十九年二月，奉璧字第 854 号敕命，准以世袭。<sup>⑩</sup>

<sup>①</sup>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三《四川八·乌撒军民府》引《土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排印本，第 493 页。

<sup>②</sup> 即墨市政协教科文卫与文体文史委员会等编：《熊崖所古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第 42 页。

<sup>③</sup> 即墨市政协教科文卫与文体文史委员会等编：《熊崖所古城》，第 44 页。

<sup>④</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己巳条，第 2489 页。段世等前往山东任职不会只身前往，除家属外，估计会带一些本族部众。

<sup>⑤</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 2258 页。

<sup>⑥</sup>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七《诏令杂考三》，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667 页。

<sup>⑦</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年八月乙亥条，第 2772 页。

<sup>⑧</sup> 乾隆《腾越州志》卷七《职官·武秩》，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 85–86 页。洱海卫在云南县治西，洪武二十二年建。

<sup>⑨</sup> 《毕节路氏长房宗谱·皇清敕授文林郎诰封奉直大夫……竹舟府君行述》，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sup>⑩</sup> 《腾冲青齐李氏宗谱》，民国十九年本家宗祠雕版。李氏始祖情况，据本谱卷一《世系表一》和卷三《碑传集一·世官记、先德记》整理。

在云贵缺少军户资源的时候，大量从省外调拨军士，带有一定的支持边疆建设的意味。在西南基本安定，山东等沿海卫所建设全面铺开的时候，从云南调兵反哺沿海，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卫所建设强调稳定，在大批军属已经随军就地生活的情况下，将其大范围调动有很大难度，既有扰乱军心的可能，又有悖于用汉族人口影响当地，即“用夏变夷”的政策导向。因此，由于明朝政府主动调防，从云南迁往山东沿海的人口并不会很多，而且应集中在军官群体。

官方调动的可能性不大，并不妨碍这些军户自发回籍。中国人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为了能在退役后回到原籍，远戍的军士往往会遣送部分子孙回故乡承袭旧业，为日后回归做准备。如徽州府歙县的胡世显，洪武十五年“受命调北征南，偕夫人陈太君来黔，留守普定卫前所”，“二世祖官德、玄德二公。官德公继承父职，留守普定卫……玄德公遵父命返回江南故里”。<sup>①</sup> 同卫之百户汪灿，到卫后才于当地娶妻黄氏，诸子皆生于卫所，但仍遣一子回到徽州故里。<sup>②</sup> 浙江上虞人顾亮，因在靖难之役中“弃职家居”，被充军五开卫，“举家编置卫之来威屯”。顾亮在卫去世后，“三子：钺，留居来威；鉴、斌还上虞”。<sup>③</sup>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目前虽然没有见到山东籍军户自发返回原籍的例子，但在类似的生活环境、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应该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让部分家属返回家乡只会是零散的，不成规模。而永乐年间爆发的安南之役则为在云南服役的军户提供了大规模逃回原籍的机会。

永乐四年七月，因为安南国主伏击了护送陈天平回国即位的明军，朱棣大怒，决定派遣大军前往讨伐。明军很快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由于没有找到陈氏继承人，朱棣决定在当地设置府县，将安南并入版图。为配合直接统治，明朝政府在安南设置了大批卫所。如永乐五年六月，朱棣下令：

交趾城中立交州左、右、中三卫，富良江北立交州前卫，昌江、丘温各立卫。市桥、隘关各立守御千户所。市桥以两所守之，粮储已令都督韩观等督广西土兵搬运，足半年之食则止。即将镇守军士分布耕种，及于已附土人内收税供给。驿传紧要处，亦令韩观于军卫有司、土官衙门摘拨军马人夫，相兼递送。存留守城军士：广西二千五百，广东四千七百五十，湖广六千七百五十，浙江二千五百，江西、福建各一千五百，云南四千。余就本处收集土军，相参守御。其合用官，听自选留。<sup>④</sup>

同年九月，“置交趾交州左、右、中、前并昌江、清化卫经历司经历及市桥守御千户所吏目各一员”。<sup>⑤</sup> 经历、吏目等文官的设置，说明卫所建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永乐五年十二月，总兵官张辅等又奏准“于原设七卫之外，再拨官军五千六百人，设交州后卫。又请设镇夷、谅山二卫，及增设十五千户所，该用官军二万二千七百有奇”<sup>⑥</sup>。交州左卫等七卫军士主要由各都司参战军士抽调组成，这次新留用的二万二千余军士应该也是来自于出

<sup>①</sup> 《胡氏族谱·明入黔胡氏族简介》，1998年依据旧墓志重修。

<sup>②</sup> 汪希鹏主编：《黔腹汪氏宗谱·入黔始祖汪灿公事略》，2001年印制。

<sup>③</sup> 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一《顾教谕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sup>④</sup> 《明太宗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癸巳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下同，第958页。

<sup>⑤</sup> 《明太宗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丁丑条，第998页。

<sup>⑥</sup> 《明太宗实录》卷七四，永乐五年十二月己丑条，第1023页。

境作战的明军。

永乐六年二月，明廷又决定“增置交州左卫之中左、中右二千户所，并交州中、右、前三卫及昌江卫之中左千户所，清化卫之中右、中中、中前、中后、水军五千户所，三江卫之中、前、后三千户所”<sup>①</sup>。

永乐十二年六月，又增设乂安、新平、顺化三卫和演州守御千户所、南靖守御千户所。虽然这几个卫所是“籍土军，以土官指挥、千户理其事”<sup>②</sup>，但明军也会派出部分官兵参与新卫所的建设。

大批明军因为新卫所的设置而长期留在了安南，这其中必然包括很多从云南都司抽调的山东籍军士。

但明朝在安南的直接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当地民众的不断反抗，明廷于宣德二年做出了撤销交趾布政司的决定。当年十一月，明宣宗下诏：

……凡交趾大小官员军民人等，有犯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总兵官、成山侯王通等即率官军各回原卫所。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官吏旗军人等，各带家属回还。镇守、公差内官内使，悉皆回京……<sup>③</sup>

明朝政府的决策颇为仓促，事先并未做仔细的准备，以致撤退在一片混乱中进行，这给了部分思乡心切的军士脱伍逃离的机会。据正德《云南志》记载：

谢氏，孙彬妻。彬，吴人，广南卫军。永乐初挈谢成交趾清化卫，生子敬。彬卒，谢守节。久之，有诏复安南国，撤戍。乡同戍者强敬由海道趋吴下。谢曰：汝父占戎籍，汝私还，勾牒必至……乃引敬匿神祠中，睨同戍者过，尽循故道徒步艰归。<sup>④</sup>

谢氏母子在清化卫随军生活，说明明朝政府在安南设立大批卫所后，同样有意识地遣送了大批军士家属到卫生活，以便安定军心。孙敬的同乡逼迫他和自己一道从海路返回家乡，说明确实存在军士趁乱脱伍的现象。谢氏母子不愿回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拒绝，反而要通过藏匿在神祠中来躲避同乡的逼迫，显示当时脱伍的现象并非少数，甚至已经形成一股难于抗拒的势力。

在山东地区的族谱资料中，经常出现所谓的效芝国、交趾国、蛟趾国、交址国、胶芝国等字样，如阴岛（今名红岛）肖氏，谱中记载始祖兄弟二人从“云南交趾国昆明县乌沙卫柳树胡同棋盘街”迁徙而来。<sup>⑤</sup> 刘德增认为这些奇怪的国名指的都是交趾，即安南国，并引用《明宣宗实录》卷九十的记载：

宣德七年五月丙子，交趾土官百户陈复宗等言曰：窃闻为臣之道，惟忠与义。臣虽生处僻方，心实拳拳于此。故虽黎利倡乱，臣等明于顺逆之理，必守君臣之义，宁

<sup>①</sup> 《明太宗实录》卷七六，永乐六年二月丙申条，第1037页。

<sup>②</sup>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二，永乐十二年六月庚戌条，第1766页。

<sup>③</sup> 《明宣宗实录》卷三三，宣德二年十一月乙酉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下同，第836页。

<sup>④</sup> 正德《云南志》卷二二《列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上海书店，1990年。

<sup>⑤</sup> 参看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第166—16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弃坟墓、遗亲戚，随诸将归朝廷。蒙嘉其心，给之公禄，奖忠劝义，无以加矣。臣亦夙夜兢惕，惭无报效。今有司欲援宽恤事例，混臣等于交趾官员之列，概送河南、山东，俾之就闲。然臣之所以舍家乡而归朝廷者，惟忠义是徇也。今乃进则远于朝廷，退则失其家乡，为忠与义，反不得安。是岂臣等本心哉？伏望止留在京，以劝天下臣子之忠义。<sup>①</sup>

以此证明确实有安南官民随着明朝内徙的官民一起回到中国，并被安置到山东等地。

山东地区有安南人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实录》有记载，在地方史志中也有很多个案可以证明。如万历《巨野县志》载：

段汝旦，原系云南义安府南靖州盘石县土官。宣德元年值黎利作乱，汝旦奉敕同征夷将军成山侯王公讨之，屡立战功，札授盘石县主簿。又从王师平定交趾有功，上嘉赏，赐宴光禄，配以官人南阳王氏，授山西繁峙县丞，仍赐田蠲租，令一子入监世袭以酬其功。未三年，调巨野县丞。因民爱，坐升知县……传称不朽。<sup>②</sup>

不过，纯粹的安南移民似乎没有必要非要和云南扯上关系。因此，对于含有交趾国或类似称谓，同时又出现“小云南”、“乌撒卫”等字样的族谱资料，笔者认为借明朝撤销安南布政司的机会脱离原伍，辗转从海路北上，并最终落户于山东半岛的原云南卫所军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谓交趾国，最初不过是为了规避清勾，但无意中反而透露了自己的逃兵身份。

另外，由于和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辽东卫所军士的家属并没有过海团聚，而是滞留在了山东半岛。如（昌邑）《陈氏家乘》记载：

始祖（得甫）原居成都南关铁白巷，洪武二年以军籍来昌邑，遂家焉。二世、三世均充辽东广宁左卫差，至四世乃罢。今该处之姓陈氏者，多吾同族也。<sup>③</sup>

辽东生活条件艰苦，军户多不乐往。为补充兵员，大批充军人犯被发配到辽东服役。这其中也包括大量云南籍人犯。如现存辽东残余档案资料中提到：

#### 云南布政司病故二名

云南府昆阳县一名，赵祥，系本县保乡社人，洪武二十五年，为……

大理府赵州云南县一名，陈系保……<sup>④</sup>

按照明朝的制度，充军人犯需要有家属，至少是妻子随行。这些人的家属出于各自的需要，同样可能和陈氏家族一样，滞留在山东半岛定居生活。

<sup>①</sup> 《明宣宗实录》卷九〇，宣德七年五月丙子条，第2060—2061页。

<sup>②</sup> 万历《巨野县志》卷五《选举志·武功》，《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影印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

<sup>③</sup> 《陈氏家乘·谱系叙略》，民国三年山东印刷公司排印本。

<sup>④</sup> 《辽宁各卫星报从直隶山东等省因罪流充的军丁亡故名册》，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第5页。

不过，无论是军户家属自发返回原籍，还是在安南服役的军士趁乱脱伍，辗转迁徙到山东，抑或是充军人犯的家属滞留山东半岛，目前都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尽管笔者认为这三个推断是成立的，但在找到足够的证据之前，只能算是一种假说。

云南籍移民大多宣称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迁到山东，不过也有少量移民的迁移时间记载为明中后期。如栖霞路氏始祖路杨柱，谱称其系明中叶随戚继光北上，“由云南移民到山东栖霞县路家沟村”。<sup>①</sup> 牟平勇氏，亦称“由云南转浙江迁来”<sup>②</sup>。嘉靖倭寇泛滥东南时，明廷确实曾调动大批客兵，但主要是从山东、广西、湖广一带调兵，没有见到从云南调兵的记录。且戚继光完成抗倭任务后即调往蓟镇守边，未曾回山东任职。是否有抗倭旧部随之返回山东生活，尚待研究。

另有记载于明末抵达山东者。如高氏：

闻祖上传谕：我高氏门中，本贯云南，耕读为业。时当明崇祯末壬午，遍地逆贼猖狂，见他处犹轻，惟云南为甚。我祖在于境内，始避难于山东，驻足高家庄，系登州蓬莱所属，仍习旧业。维时我始祖文增已至残年，随歿于此。奈该府豪强聚众，亦不免掳掠良民。我二世祖兄弟三人，率子侄辈，弃业奔海，始至盛京……<sup>③</sup>

崇祯壬午，即崇祯十五年，正是山东惨遭清军蹂躏的年份。谱中称“遍地逆贼猖狂”，“惟云南为甚”，明显与史实不符，似乎是主动向“云南”靠拢的产物。不过从万历时期开始，直到崇祯年间，包括族谱中经常出现的乌撒卫在内的云、贵、川交界地带一直不太平，先有杨应龙之乱，后有奢仲明、安邦彦等的叛乱，迫使明朝政府投入了巨额人力、财力才镇压下去。动荡的社会环境无疑会迫使部分当地民众外逃讨生活。加之杨应龙等人的叛乱中夹杂着严重的民族对立，会进一步促使当地汉族人户向外迁徙，不排除部分民众会远徙到北方生活。只是这同样需要明确的证据。

与土著居民相比，移民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因而大多有一种从众心理，以寻求心灵上的归属。这在山西移民、枣强移民中有明显的反映，在云南移民中间也不例外。如莱阳张氏，在崇祯七年进士、十世孙张允抡于顺治十八年六月所作谱序中称：

张氏源派原系济南府武定州，塔儿埠乃其故土也。国初莱阳土旷人稀，拨补静（靖）海卫军籍，始居鲍村社汪家庄，后迁大夼社杜家泊。我之始祖一代讳仲卿、仲义。后仲卿生文斌，又移居任家庄，以作贊于任氏，遂居焉。后张氏颇日繁盛而任氏绝矣。斯先是从来之大略云。<sup>④</sup>

但在民国二十年张氏十七世孙张隆德所撰续修族谱序言中，张氏的来历却变成了下面这样子：

吾族原籍肇自云南，胞堂兄弟十一人，明初叶拔于山东者四人。讳仲法者移口外宣化府万全县，讳仲仁者居济南武定府惠民县塔儿埠，讳仲卿、仲义者迁莱邑凤山乡，

<sup>①</sup> 路家村《路氏支谱》，光绪三十年修，转引自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祖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sup>②</sup> 民国《牟平县志》卷三《氏族》，济南山东印刷局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sup>③</sup> 《高氏宗亲谱册·序》，转引自李林：《满族宗谱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sup>④</sup> 《续修张氏谱书·张氏族谱序》，民国二十年烟台东鲁印刷局代印本。

始寓汪家庄，既移杜家泊，吾始祖也……嗣后族大户繁……至寓蓬莱、福山、栖霞、平度、济南并关外异县者。<sup>①</sup>

张氏后人张宏德系天启五年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他是莱阳军籍。谱中所附《张氏武定州原籍宗谱》的序言中也称“张氏先世原世籍武定州南乡，后移武定北十里省屯镇”<sup>②</sup>，可见张允抡对祖先来历的记载是正确的。

除了靖海卫军籍外，张氏旧谱中曾记载“二世祖有讳文通、文中者，明初拨补天津卫军”，是天津卫军籍，“分居张旗屯”只是“未明其是仲卿祖之子、仲义祖之子”<sup>③</sup>，只字未提及张仲卿兄弟还有其他弟兄。

张允抡的序言作于顺治年间，斯时修谱之风尚未盛行，估计所谓“云南”或“小云南”的提法并未占据主流，因而张氏旧谱尚能秉笔直书。但在康熙、乾隆年间修谱之风大盛后，受从众心理的影响，想必张氏对祖先的记忆也难免“泯于众人”，这才有了原籍云南的记载。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熊崖所《王氏宗谱》称祖籍云南省桃花村，后因灾迁徙河南省归德州，“一世祖王相尧于元至正二十五年从军”。<sup>④</sup>王氏明显来自河南。又如栖霞梁氏，自称“始祖起家于陕西省华阴县小云南古槐树底下，明洪武二年正月十七日奉旨启行，抱谱携经，六迁入莱阳”；栖霞孙氏称“始祖孙四公，明洪武二年由江苏省小云南槐树底迁至莱阳城”<sup>⑤</sup>。明明是陕西人、江苏人，却硬要和“小云南”扯上关系，趋同从众心理暴露无遗。

## 结语

在山东半岛众多的外来移民中，“云南”或“小云南”移民无疑是最神秘的一支。而在从众趋同心理的作用下，大批与云南并无瓜葛的外来人口有意无意地把本家族描绘成云南移民，无疑又加重了这层迷雾。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移民后裔也开始对自己的云南祖源产生怀疑。如栖霞韩氏谱称“我韩氏籍栖霞，由明及今五百余年矣。或谓来自云南，或谓来自武定，俱弗深考”<sup>⑥</sup>；牟平磨山于氏“多云移自云南，或云出自斥山与大水泊”<sup>⑦</sup>，等等，“云中之南”等解释亦随之而来。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小云南确实存在，包括部分少数民族的云南移民也有迁徙到山东的可能，但直接证据的匮乏，致使我们始终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sup>⑧</sup>笔者提出的三个假说目前也在无法证实之列，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新资料的发掘。

<sup>①</sup> 《续修张氏谱书·续修族谱叙》。始祖张仲卿、张仲义兄弟的原籍，在本谱《世系》被具体记载为“云南大理府浪穹县川横沟”。

<sup>②</sup> 《续修张氏谱书·张氏武定州原籍宗谱又叙》。

<sup>③</sup> 《续修张氏谱书·世系》。

<sup>④</sup> 即墨市政协教科文与文体文史委员会等编：《熊崖所古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sup>⑤</sup> 安定郡：《梁氏宗谱》，1922年修；西李庄《孙氏族谱》，1935年修。转引自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祖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sup>⑥</sup> 大韩家村《韩氏谱书》，光绪二十六年修，转引自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祖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sup>⑦</sup> 民国《牟平县志》卷三《氏族》，民国二十五年山东印刷局铅印本。

<sup>⑧</sup> 部分学者提出的小云南移民系被发配的吴三桂叛军成员的观点同样无法提供直接的依据。